

东瀛 文撷

——20 世纪中国文学论

靳丛林 编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东瀛 文薈

—— 臺灣與中國文學交流

劉鳳翥 編輯

◎ 臺灣文學研究叢書

东瀛文撷

——20 世纪中国文学论

靳丛林 编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瀛文撷: 20 世纪中国文学论/靳丛林编译.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10.

ISBN 7-5601-2955-2

I. 东… II. 靳… III. 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
IV. 1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415 号

东瀛文撷—20 世纪中国文学论

靳丛林 编译

责任编辑: 邵宇彤

封面设计: 孙 群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58 000 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7.00 元

ISBN 7-5601-2955-2/I · 13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3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499826

网址: <http://jlup.jlu.edu.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目 录

序：有薰风自远方吹来·····	孙玉石（1）
日本的鲁迅研究·····	丸山升（18）
民族的命运·····	丸山升（61）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加纳治五郎给	
第一批毕业生讲话的波澜·····	北冈正子（76）
鲁迅与弘文学院学生“退学”事件·····	北冈正子（93）
鲁迅最初的妻子朱安·····	桧山久雄（142）
《肥皂》是怎样作成的？·····	谷行博（154）
《腐蚀》的背景——茅盾与国民党	
“特务组织”·····	阪口直树（171）
“4·12”政变前后后期创造社同人动向——从与	
留日学生运动的关系谈起·····	小谷一郎（204）
钱杏邨的“新写实主义”——与藏原惟人的“无产	
阶级现实主义”有关问题之考察·····	芦田肇（223）
从1937年“反差不多论争”看沈从文	
与南北文坛的地位·····	尾崎文昭（252）
巴金和他的《寒夜》·····	立间祥介（283）
与巴金谈文学二小时·····	木下顺二（293）
关于巴金——读《随想录》·····	松井博光（297）
挫折的诗人——张贤亮试论之一·····	山田敬三（309）
后记·····	（328）

序：有薰风自远方吹来

孙玉石

靳丛林教授将他近十多年来翻译的日本友人论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些学术文章，汇集成集，名曰《东瀛文撷——20世纪中国文学论》，送到我手里，邀我为之写序。近日虽然杂事甚多，又颇为懒散，但面对书里许多我熟悉而尊敬的日本友人的文字，触摸那些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抱着真诚热爱与严肃思考的学者们的心，无论如何也不能推却了。

这本书里面，收入文章的12位作者中，有9位学者，是为我所熟悉尊敬或有过交往的朋友。算起来，最早认识的，当是尾崎文昭教授了。那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作为东京大学的助教，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王瑶先生的指导下，进行鲁迅与周作人等方面的研究。我因为协助王瑶先生做一点杂务，便与他相识了，并建立了真诚的友情。除平时的一些交往外，我们还曾经一起，奔上海，赴绍兴，下富阳，寻访关于鲁迅、郁达夫的旧迹与知情的故人，所经所闻，如今犹历历在目。

1983年春天，正是樱花烂漫的季节里，我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于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在丸山升先生的领导和悉心关照下，工作与生活。他在繁忙中，还特意来学校听我的讲义。我们几乎是每周都要见面，常有机会作或长或短的学术交谈。我参加过由他主持的“中国3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活动，此外，还一起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汉园集》读书会”。我先后曾与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或闭门读书，或“合宿”研讨，或在他的别墅里小住，与青年朋友们，在美丽的长野山区

里，“晴游雨读”。这一年半的期间里，与他的同事伊藤虎丸、尾上兼英、木山英雄、北冈正子、釜屋修等知名学者，与他的学生佐治俊彦、芦田肇、小谷一郎、近藤龙哉、藤井省三等青年学人，都逐渐熟悉起来，成为好友。他们的性格为人，他们的言谈文章，他们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感情，都随着时日的荏苒，渐渐深深印在我的心中了。我离开日本的前夜，3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们，在上野公园附近一个叫“土俵や”的居酒屋，为我送行。交谈之余，我们一起唱了很多中国歌曲：《松花江上》、《渔光曲》、《太行山上》，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那份真挚的情意，那种心与心的交流，是为我所终生难忘的。

1994年秋天，我再次应邀到神户大学讲学。又是另一个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在神户大学山田敬三主任教授的领导下，在背山面海的美丽的六甲山麓，度过了一生最难忘的时光。十年前访问京都时，已经认识的山田敬三、片山智行等教授，也是鲁迅研究的同行，这时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我每天上班的研究室，就在山田敬三先生研究室的对门。我们成了1995年发生在神户的“阪神大震灾”中患难与共的朋友。地震之后，全城停电停水，连街上自动售货机里的各种饮料，都被抢购一空，到处无法购到任何生活用品。在这紧张的日子里，是山田敬三教授，不知从哪里，想办法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冒余震的危险，沿着到处是络绎不绝逃难人群的“道路”，一直把我们送到很远很远的——一个通往大阪的电车站，然后转到京都。这时是丸山升教授让芦田肇君，一口气开了11个小时的车，到京都接我们夫妇，第二天，又开了11个小时的车，将我们接到了长野，在那里和东京“避难”一个月。在关西生活的日子里，我应邀参加京都的文学研究会在“小豆岛”的合宿，在京都的学会上作学术讲演，发表关于废名与晚唐诗倡导的论文，都是阪口直树教授亲自安排的。归国后，我们又在武汉举办的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相遇。他的关于国民党文艺研究的严肃著作，曾寄赠给我，使我颇为开阔学术视野。日本著名的茅盾研究专家松井博光先生，是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在东京的一次学术会上，经丸山升先生介绍，与他见面，作过简单交谈。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很有风度的学者。他的关于茅盾的许多研究成果，是为我所敬佩的。1990年一次学术会议后，我到广岛作短暂旅行。在广岛大学桧山久雄教授的研究室里，与他曾晤面交谈，并得到他馈赠的《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大作。

.....

在这里，我不赘文字繁冗，唠叨起这些往事，只是想说明，面对这些大多为熟悉的友人的文字，不仅勾起了我许多永远不能忘怀的亲切的回想，也对于他们认真的思考与探索的成果，产生了一种认知与理解的冲动。一个曾经获得过往昔真情的人，永远不能忘怀于真情的过去。

激发我的学术兴味，使我不能不动笔写一些话，更重要的，当然还是这些论文本身提供的思考空间与学术价值，是日本学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有薰风自远方吹来，自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虽然，这里面的一些论文，不是经过自觉选择的有完整系统学术文章，而是译者多年随时根据自己兴趣和关注而翻译的成果，这个汇编文章的论集，不能够完全代表日本学者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达到的最好成绩与水平。例如，为我所尊敬的老朋友伊藤虎丸教授（我们哀痛于他不久前离开我们而去了！）、尾上兼英教授、木山英雄教授、片山智行教授、丸尾常喜教授，以及其他一些青年有为的学者们的文章，很多就没有译介收入。他们的重要学术论文，多已由其他学者，分别译介到中国了。但是，诚如卞之琳 1930 年引述纪德《纳蕤思解说》里所说的：“一点神话本来就够了”。读一遍这里已经汇入的十余篇学术论文，我们仍然可以大体上看得出，日本学者们对于中国现当代

文学的学术关注、理论姿态、思维特征与论证方法的某些主要特色来。

日本学者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关注最多的，当然还是鲁迅。20 世纪文化巨人鲁迅，可以说是最有资格成为世界性的现代中国作家了。鲁迅的文学生涯与成就，引发了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大地震。他一生结成的独特而深厚的与日本的文化之缘，他对于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的深刻洞察与理解，使他不仅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至今仍然是不可超越的，几乎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浸润着他的精神影响，也使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及侵略战争失败之后，颇获得了许多富于思考与反省自己民族而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们的心。

在日本，自 20 世纪 20 年代初，就开始介绍鲁迅、周作人的文学活动与作品了。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又开始系统译介鲁迅的著作。到四五十年代以后，对于鲁迅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时期：一些具有思想家品格的学人参与研究鲁迅，出现了逐渐走向深化，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精神特征的思想与学术成果，和一些在史料考索与实地调查基础上写成的鲁迅研究专著与学术论文。如竹内好的《鲁迅》、丸山升的《鲁迅与革命文学》、伊藤虎丸的《鲁迅和日本人》，木山英雄研究《野草》的长篇论文，尾上兼英关于鲁迅与尼采的学术论文，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阿部兼也教授著的《鲁迅的仙台时代：鲁迅的日本留学之研究》等等。“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这些“命名”本身，在学界的出现与被接受，就显示了日本的鲁迅研究与日本民族命运以及时代走向的焦灼思考之间的深刻联系，日本学者学术研究思路方法不断深化之间的内在嬗变和各自取向，以及由这种联系的不断深化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研究前行中的历史性与阶段性。

作为这个研究史链条中重要一个环节的代表者与参与者的丸山升先生，这里收入的他的学术史性质的论文《日本的鲁迅

研究》，以宏观的理论审视和严密的史料叙述结合的平实文字，给我们勾画和论述了近八十多年里日本鲁迅研究史的一个清晰的轮廓。我读丸山升先生这篇论文，以及选自他《鲁迅与文学革命》一书中的《民族的命运》，最有兴味的，是他的平静历史描述和沉实的理论眼光。这里有几个方面应该说到。第一，他清晰地描述了日本对于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的接受，怎样由涓涓细流的萌芽，到众多学人参与介绍和研讨的学术研究 with 精神思考的磅礴潮流；怎样从文学成就的认知到民族自身发展反省性的思考，再到鲁迅与其周边文学现象本体性研究的深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颇富洞察力的历史描述，为我们展现了日本鲁迅研究自 20 世纪 20 年代初至 80 年代的逐渐走向多元发展与深化成熟的过程。第二，他对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产生并影响于战后整个五六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精神的“竹内鲁迅”的解释，是相当深刻的。丸山升先生对于日本 1940 到 1950 年走过的历史，抱着非常清醒的追问与批判的态度。他亲自参与了日本觉醒的知识分子寻求从美国束缚下独立那个时代里发生的正义抗争的潮流，并承受过维护体制的力量加给他身心的苦难。因此，他能够以民族命运同行者和审视者的眼光，比起一般思考者更具超越性的思想，努力准确地把握和透彻地分析“竹内鲁迅”独有的思想特色和学术内涵。丸山升谈到竹内好的《鲁迅》一书的时候说，问题不在于承认还是否定这本书对日本现状的抵抗，而在于由此深入一步，看他的抵抗所获得的“文学家鲁迅”形象的内在必然性是什么？怎样去看待它？丸山升引用本多秋五关于竹内好的论述：他用“政治与文学”的形式所抓住的问题，实际上是“宿命与自由”或“从绝望中再建自我”的形式所烦恼的问题，有一种共同的体验。竹内好《鲁迅》一书所谈的，正是他所经验的这种文学史上称之为“舍斯托夫体验”，即“在生命的本源里，用理想主义和合理主义而不能理解的某种不合理的丑陋的东西，处于无路可

走时，不容分说的一种东西出现了。尼采的‘人有蛇牙会怎样？有人把脚后跟搭在我们的额上都不知道’的真理，昭和文学通过舍斯托夫体验告诉了我们。”做了这些引述之后，丸山升认为：基于这种日本的现状与竹内的体验，使竹内对“思想”的见解，形成了浓郁的独特色彩。竹内竭力避免使用鲁迅思想已经形成……主义，或是分类为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等等。他在《鲁迅》一书中坚持认为：

许多批评家都说这一时期已经完成了转变。……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描述这一转变，例如从进化论到阶级斗争，从个人到社会，从虚无到希望等等。我并不认为这些语言没有恰当的表现力，但是倘若认为它们起什么决定性作用，我是不同意的。那是把思想从人身上抽出的方法。这种方法就那事情本身来说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把它看作超越行动的人之上，是不能做出成功与否的判断的。

我所关心的事，不是鲁迅如何变，而是如何不变。他当然变化了，然而他没有变，可以说我在不动之中看到鲁迅。

引述了竹内好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之后，丸山升对于“竹内鲁迅”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竹内一直在探求贯穿在鲁迅变化中的不动因素，“回心”、“文学家的自觉”等语言所表现的不动的东西，正是鲁迅身上几乎性格化气质化的某种因素。丸山升提出，将“思想”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是相当困难的。竹内对此有深刻的体验。他所直面的问题是：对于人来说，最后留下的是什么？靠什么而生存？从这一角度去思考鲁迅，是很自然也是极为切实的工作。“鲁迅之于竹内，是体现着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的近代中国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是对他本身、对日本近代批判的一面镜子。产生于竹内的这种鲁迅形象，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有巨大的影响力，是

为了反思带来那场战争的日本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而且认真思考未能阻止战争的弱点是什么？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诞生了新中国的中国抱有惊诧与敬意。鲁迅就是这样吸引了日本许许多多人的心。”丸山升先生对于“竹内鲁迅”的这些非常深刻的分析，包含了他自身对于鲁迅文学思想和对于日本近代历史的双重的深刻理解。从这些论述与阐释里，我们看到了在鲁迅学术关注背后隐藏着的那一代真正的日本学者的心，看到了超越一种史料堆砌与评述的鲁迅学术史“研究”，而呈现出一个思想家型的学者的高远与大气。丸山升先生这篇论文，第三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方面，是他对于近些年来日本鲁迅研究趋势与走向的简要概括。他这样指出，一，在日本的对于鲁迅诸问题的研究中，摆脱了研究鲁迅与思考日本“近代”问题紧密联系的注重“问题意识”的趋向，鲁迅文学本体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的倾向在增强。二，围绕以鲁迅为中心相关联的诸事件，鲁迅周围的文学家，与鲁迅对立的文学家，以及战后中国公式化的文学史评价中流露出的若干史实，充分展开研究，使许多学术问题不断得以明确。三，为进一步深入鲁迅的内部世界，应该开辟更多的领域和方法。他的这些近期研究方向概括与研究成果介绍，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日本鲁迅研究的不断拓展的实际，也对于鲁迅研究在日本学界的走向提出了富有预示性的展望。

丸山升先生在论文中，谈到进一步深入鲁迅的内部世界，应该开辟更多的领域和方法。这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北冈正子教授的鲁迅研究工作。他这样说：“近年来北冈正子所做的工作是划时期的工作。她详细探讨了鲁迅留学日本时所写论文的材料来源，包括青年鲁迅有时像用剪刀加浆糊组成的立论部分，但不管怎么说，在剪刀加浆糊的方法之中依然显出鲁迅很强的独立性。”这里指的是北冈正子教授几乎花了十余年工夫所做的《摩罗诗力说》材料来源的考证工作。陆续发表的这些

非常出色的系列性的学术论文，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1907 年至 1908 年，鲁迅在日本发表于《河南》杂志上的《摩罗诗力说》等几篇文言文，其思想的深刻性与前瞻性，在当时确实不同凡响。过去因为过分看重其民主主义思想的局限，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与解说。它的深刻内涵与思想价值，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才得到洞烛发微，全面阐释，而且有越来越评价越高之势。但是，有些过分夸饰的意见，其实是不恰当的。首先，当时鲁迅只有二十六七岁。这些论文中包含的一些思想，还很难说达到了怎样成熟，与其他民主主义思想家相比较，其深刻的程度，不能言之过分，而且也都存有类似的局限；其次，鲁迅的许多见解，多是直接来自西方或经日本传媒渠道从西方吸收过来的。其中虽不少部分，在“剪刀加浆糊”之外，有独立思考的内涵与价值，但并非整体上看全部都是原创性的思想；第三，这些文章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也不应该被无限度地夸大。事实应该如瞿秋白早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所说的那样，鲁迅这些早期论文中的崇论宏议，大多被淹没在当时排满的议论声中了。北冈正子所做的非常坚硬的工作，从鲁迅思想材料来源考索的角度，为我们接近正确地认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的言论思想，分清楚哪些可吸收与借鉴，哪些是移用与照搬，哪些是有新意的改造，哪些是自己独立的原创，然后给它一个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历史评价，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照基础。丸山升先生称她的这一工作，为日本鲁迅研究史中“划时期的工作”，我想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北冈正子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将中国古代汉学中“和近世的科学研究法极相近”的“科学的古典学派”（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方法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

这种治学的态度、路数和方法，也体现在本书所收她的两篇论文中。它们是《鲁迅与弘文学院学生“退学”事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加纳治五郎给第一批毕业生讲话

的波澜》。前一篇，是涉及鲁迅留日生活时的具体事件的考索，可以增加我们对于鲁迅当时历史处境的认识。后一篇《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一文，比较起来更值得我们重视。我们谈论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于它在鲁迅一生思想与创作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和评价，往往仅仅从既有材料的理论分析的层面上进行，不断加码，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多少年来，却很少有人去发掘整理史料，更为准确一些地说明晚清以来改造国民性思潮的流行与鲁迅思想之间的关系，去考索鲁迅这一思想关注及与好友许寿裳进行的讨论，直接影响的源头在哪里。这项工作的后一部分，还是由北冈正子做了。北冈正子的文章说，杜迈之编著的《杨度传》（1979），日本中村义的《加纳治五郎与杨度》（1985），二者都依据《新民丛报》所刊载的《支那教育问题》，叙述了鲁迅在留学弘文学院时，校长加纳治五郎与杨度之间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但是他们不仅陈述的差异很大，而且哪一方面都没有提到给予鲁迅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问题的影响。北冈的论文以丰富的史料，详细叙述了加纳治五郎与杨度讨论国民性的经过及具体内容，论证和分析了当时作为弘文学院学生的鲁迅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讨论，受到杨度和加纳讨论诱发的可能性，以及在哪些思想上（如奴隶性的由来和如何救济等着眼点）可能接受了杨度思想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说：“鲁迅与许寿裳的所谓国民性的讨论，应该看作是受加纳与杨度讨论的直接的波动。这一讨论不该一般性地纳入视野。”从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开始，到鲁迅国民性讨论接受来源论释，北冈正子的这些工作，在一些人看起来，可能是不屑一顾的“小道”。但她却扎扎实实地去做了，而且一做就是几十年。她所提供的这些研究著述，不仅自身是带有永久性的极为坚实的学术成果，也为我们鲁迅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走向科学化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方法论的启示。

不作宏阔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企图营造轰动性的理论效

应，而是注意选择比较新颖，有学术延伸价值，或素有争议的学术课题，常常是从具体而微的地方入手，用力求详尽而辛苦搜寻得来的丰富史料，进行扎扎实实的层层分析的剥笋式的论证，总是力求在前人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一些（哪怕是一点点！）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特别尊重研究课题的学术史，尊重前人的学术劳动，不重复别人已经论证过的观点，注意学术研究的原创权与承袭性，始终坚持将别人的学术的终点，作为自己的学术起点，不重复或因袭别人的观点，即使必要时有所借用，也一定给予注明。如果有了不同意见，确有学术价值，会毫不客气地进行讨论与争辩，批评与反批评，即使是很熟悉的朋友之间，也不会因为考虑“面子”而规避和沉默，直到因论争需要连续写文章实在疲劳了，无法继续下去，方宣布停笔“休战”。特别注重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开掘与发现，利用他们所具有的优越条件，进行或近或远的国内国外的资料寻访，常不辞辛苦地去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内地各小地方，去作“田野调查”；为一个作家的重要材料，专程远赴欧洲查寻；这样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论文或著作，不仅具有史料发现的丰富性，而且有史料发掘的新颖性。日本学人的这种在实证与理论结合，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进行富有开拓创新性研究的科学理路与治学方法，在本书译介的一些论文中，从不同的侧面，或多或少地都有所体现。

桧山久雄教授的《鲁迅最初的妻子朱安》一文，对于鲁迅生活中过去一个讳莫如深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而简略的论述。他首先是清楚地申明，自己的写作，是参考、接受并整合了俞芳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段国超的《鲁迅与朱安》等许多著述的史料与观点，得到他们研究成果的启发，努力化成了自己的脉络清晰的理性叙述；同时，也坦然地对于一些观点或史料的推论，说明了自己保留的意见。如在《〈两地书〉研究》中，论及鲁迅

1906年受母亲之骗，从日本匆匆回国完婚之事，认为鲁迅忍痛选择了“克己奉母”的一条路，主要“是鲁迅的性格所决定的”。但是，《研究》里还进一步指出鲁迅的肺结核病，作为对当时的选择起到一定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鲁迅有令他苦恼了后半生的老病肺结核，《研究》追溯他的发病是在鲁迅的留学时代，当时他已经预想到自己的短命而灰心，由于这一“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顺从了母亲。桧山久雄先生论文里认为，“这个大胆的推测，现在还缺少充分的证据，作为我来说只能持保留意见。”他既充分肯定《研究》中对于鲁迅妥协性格在“完婚”一事中所起作用的分析，但又不赞同鲁迅预想自己肺病短命原因的“大胆的推测”。仅此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在学术探讨上，他们尊重别人的成果，但坚持注重“充分的证据”的实事求是的意识与学风，即使在这样一些细微之处，也可以见出日本学者治学的特点来。写在三十多年前的芦田肇教授的《钱杏邨的“新写实主义”——与臧原惟人的“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有关问题之考察》长篇论文，先是分析了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以适应“现在”的“时代”为轴心，否定了鲁迅、阿Q及《阿Q正传》的“死亡”，在一年之后的《鲁迅》一文里，同一个钱杏邨，又让鲁迅、阿Q及《阿Q正传》“甦醒”过来，他从这一评价的“转变”中，看到了“革命文学派”对“同路人”的政策性要素介入，他并由此进入，仔细地考察和讨论了日本臧原惟人的“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理论在中国1930年的引入，及其对于钱杏邨关于茅盾《蚀》三部曲的错误批评，对于其倡导的“新写实主义”的负面影响。他找到了钱杏邨对于鲁迅、茅盾批评发生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的契机，就是与发表他的文章刊物同时，发表的林伯修翻译臧原惟人的《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之间的接受与关联。文章还进一步准确地论述了钱杏邨怎样接受了臧原惟人《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中的“第一命

题”——作家“首先必须获得明确的阶级观点”，而架空了其“第二命题”——作家须有“严正的写实主义态度”，即对艺术创作技巧与方法论的要求。文章揭示的事实是：含混错误的理论接受带来了怎样的文学批评的偏颇。这篇写于我们“文革”时期1971年的讨论钱杏邨“新写实主义”的文章，因为严格的实证方法与扎实的史料运用，不仅在当时具有超前性，今天读起来仍然还有生命力和参考价值。小谷一郎教授的《“4·12”政变前后后期创造社同人动向——从与留日学生运动的关系谈起》，同样是一篇搜阅丰富史料基础上进行重要文学现象历史考察的论文。通过后期创造社同人留学日本的学习生活与文学思想的足迹，观察他们在“4·12”之后提出的“革命文学论”与文学思想“左转向”趋势，同日本近代文学的政治走向，同风靡一时的“福本主义”之间存在的深层联系，从而提供了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文学思潮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关系的某些线索。其论述的实证性与在写作当时理论思考的新颖性，给论文带来了学术生命力。小谷一郎作为学生曾与伊藤虎丸先生合作，在日本整理编辑出版过创造社的系统史料。他这篇论文对于一些史料的发掘，显示了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尾崎文昭教授的《从1937年“反差不多论争”看沈从文与南北文坛的地位》，写于1980年中期，时间稍后一些。他既有实证性研究的史料功夫的坚实，又富有创造性思考问题的理论思维的绵密。“反差不多论争”，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中关于沈从文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尾崎文昭没有重复别人的足迹，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避开论争本身的历史过程的梳理，从这场论争来看沈从文与南北文坛的地位及关系。他精心地梳理了各家对于沈从文观点批评的共性与差异，非常细腻，条分缕析。对于当时一些批评的分析（如关于唐弢文章），很见他做学问细致入微的特征。论述都很有见地。文章没有就政治视角过多臧否这样一个大家熟知的文学现象，而是将沈从